

耄耋老人张瞻明向天一阁捐赠一批家藏股票单 旧股票单里的宁波帮传奇

王静

丁酉初春，家居上海的张瞻明先生向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捐赠了一批股票单，共计35件。

“天一阁是纸质类文献收藏、研究和修复中心。张老先生捐赠的这批股票单，在品种上弥补了天一阁此类典藏的空白，拓展了收藏范围，也有利于天一阁对民国以来纸质类文献的分析与研究。股份制是民国期间一种先进的企业制度，这35件捐赠品反映了宁波人当时的人股、参股情况，体现了宁波人善于融入与创新的精神；它们作为实物见证，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张氏家族及宁波帮的创业史。因而，张老先生捐赠的这批股票单和相关档案具有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价值。”天一阁博物馆典藏研究部主任饶国庆说。

“招商局账房”娶了慈城千金小姐



张福彭、张瞻明父子早年合影照 (王静 供图)



张瞻明先生捐赠的股票单



张福彭投资的中国钟表公司股票影印

现年94岁的张瞻明先生，自小在宁波长大，读小时去了上海，此后一直客居异乡。岁月悠悠，宁波是这位耄耋游子的乡愁，尤其是看到《宁波通讯》刊登的《甬籍商人张福彭》一文后，捐献家中珍藏的35件股票单，成为老人一大心愿。

关于这些股票单，张先生是这样介绍的：“原来在上海的宁波生意人有个‘星期聚餐会’，父亲张福彭是发起人之一，参与者大多是国货业、钱银业的宁波同乡，聚餐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振兴民族工业，实行实业救国。遇到有人准备投资办厂或开公司，聚餐会的成员皆会买股参与投资，这样就有了这些股票单。”

那么，这些股票单又有着怎样的前世？据《上海金融志》记载：“股票交易业自民国10年（1921年）信交风潮后被逐渐冷落达20年之久。”抗战前后的上海证券交易中，大多是公债，“股票不过应声即响，拍拍空板而已”。面对畸形的繁荣，在沪的“宁波帮”抱团取暖，参与民族工业的振兴。这些股票单是宁波人爱国、进取和团结的重要书证。

捐赠股票单上书写着的投资人，大多是张福彭及其家庭成员。围绕这些半个世纪前的股票

单，幼子张福彭才6岁。所幸，冯家痛惜女儿的不幸，将黄道大门的西厢房抵给女儿一家。张福彭入住通判冯家，真正成了外婆家的“外孙皇帝”。蒙读时的学智启蒙，童年时的做人之道，张福彭自幼接受的是千年望族的家训。

■外出学做生意，热衷慈善事业

旧时的宁波有送子弟出门做生意的习俗，张福彭也不例外。他15岁时，被送到嘉兴天德药行，跟着他的老板舅舅学生意，满师后又到上海永康参店见习生意。据其子张瞻明回忆，父亲张福彭约于1925年开始自己创业，先开设振恒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此公司在我国的昆明、上海、广州、香港以及新加坡和越南均设有办事处。后与他人合资先后在昆明开设了恒丰百货公司和恒祥百货门市部，在新加坡合办中国贸易公司，专营办公用品及文教用品等等，生意越做越大，张福彭在昆明亦渐有名气。“有一次，母亲叫阿姐瞻英写信，只写昆明市张福彭先生收。父亲回家时，拿出这封信封，让我们看，还批评阿姐写信介粗心，连

收信人的地址都忘了写。我们姐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母亲却笑了。原来是母亲故意试探父亲在昆明的名气到底有多大。”张瞻明笑着说。

张福彭6岁丧父，早年的不幸成就了他吃苦耐劳的性格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张家的贫寒以及冯家的家风影响了他的钱财观念和拳拳爱心。为此，他白手起家，千里经商，成为有影响的商人，先后兼任中国红十字会昆明分会副会长，昆明红十字会卫生学校副校长，昆明消防队长等职。张福彭兼任红十字会之类的慈善工作，除了做一些具体事务外，更多的负有经济责任，比如进行各种募捐。当时沪甬与昆明交通不如现在方便，但因生意上的联系，宁波同乡去昆明的还是不少，尤其是抗战后，当时宁波同乡看到一旦警报响起，张福彭便按捺不住，马上上街了解动态，并让医院、消防等部门做好急救准备。张福彭致力于昆明的慈善事业，其行为感染了同行与朋友，大家纷纷慷慨解囊，因而宁波商帮热心捐资红十字会的事迹，一时在昆明成为美谈，这自然也扩大了张福彭的名气。当时的张福彭还任宁波旅滇同乡会会长，他和他的同乡会同仁还创建佛教公墓，主要服务于流落异乡的宁波人。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召开全国各地红十字会代表大会，张福彭作为昆明的代表出席会议。只可惜5年后，他因突发脑溢血客死昆明。

■张福彭与“钱业领袖”秦润卿私交甚密

由于种种原因，张福彭其人其事鲜为人知。

笔者从2015年10月出版的《秦润卿日记》中发现：张福彭与近代上海著名钱业领袖，曾被视为“江浙财阀”核心成员之一的秦润卿交往甚密，无论是书信来往，还是登门互访。比如，每次张福彭回上海，其子张瞻明大多借秦先生的汽车前去接站。翌日，张福彭准会去秦宅拜访，接着是双方的设宴互请；秦润卿族

侄长卿去云南读书，秦先生也是拜托张福彭照顾，多次寄往云南的学费或用品也托张转送。《秦润卿日记》还有两处记载了秦张两家的关系。一是1944年11月26日，张冯氏（张福彭母亲）70大寿时，秦先生到上海福熙路（现为延安中路模范村）的张宅道喜，并“赠送钱罕书写的寿屏一堂”；一是5年后的10月15日，张冯氏去世，秦先生又去安乐殡仪馆吊丧。其间的1946年1月23日，德高望重的润卿先生还做起媒人，给张福彭的公子张瞻明介绍女朋友，那女子便是后来的张家媳妇。

此外，《秦润卿日记》多次写到的星期聚餐会，比如“应某某招饮，座中国货界人居多”，必会提到张福彭之名。其中一次星期聚餐会的议题是筹办华兴水泥厂，张福彭参与发起创办于湖北，并且是以妻子郑杏凤之名投资。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该厂财会课还发函到上海，给投资者汇来历年的股息。这些来往信函，如今一并被天一阁收藏。

■股票单折射出宁波帮的创业传奇

张瞻明捐赠的股票单里，书

有张福彭、郑杏凤夫妇以及张瞻明、张瞻英、郑延源等股东名字，他们投资、参股的股份公司大多创办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涉及轻工、纺织、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化工、制药、橡胶、运输等十多个行业。人们较熟悉的有中国萃众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钟表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太乙调味粉厂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冠生园食品公司、梅林罐头食品厂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码头仓库公司和上海新华印刷厂等。一些企业的产品，如“414”毛巾、“三五”牌台钟、“佛手”牌味精，曾经影响过几代中国人。还有“梅林”牌莱阳蜜梨、糖水菠萝、糖水杨梅与“冠生园”月饼，这些食品甜蜜蜜，香喷喷，至今还留在宁波老人的舌尖上；至于“三五”牌台钟，它与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共同组合成一个专用名词——“三转一响”，曾经是一个时代的时尚，是宁波姑娘出嫁的奢华嫁妆。

张老先生捐赠的这批股票单和相关档案中，其中一张“三五”牌台钟股款收据，还能引出一段宁波人与钟表业的史话。1912年，孙延源、孙梅堂父子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设在宁波的美华利制钟工场迁到上海杨树浦，3年后，在闸北天通庵镇建起工厂，用机器制造各种零件，成为全国最早生产机械时钟的厂家之一，载入上海的史册。这一年，新厂制作的各式时册，送往美国巴拿马博览会荣获金奖。之后的8年间，美华利制钟厂先后为上海青年会、先施公司、上海电话局及北京中国饭店等104座建筑制造了336只大钟，“宁波制造”由此誉满大江南北，孙梅堂更是享有“钟表大王”之美誉。虽然美华利制钟厂于“一·二八”淞沪战役的炮火中，但中国制造不绝。此后，宁波人李康年投资创办中国钟厂，生产“三五”牌台钟，张福彭等同乡积极参与“三五”牌台钟的制造……

老宁波称味精为“味之素”，源于味精曾是日本的舶来品。1922年，宁波北仑的张逸云与他人合资创办天厨味精厂，以半机械化方式生产“佛手”牌味精，并渐渐替代日本的味之素，成为我国近代最大的调味品工厂。太乙调味粉厂股份有限公司亦是民族资本投资的调味厂，张福彭先后参股万余股。1956年，“太乙”并入天厨味精厂，创造年产265吨味精、同比增长163%的记录。股票单上的宁波人，不仅仅是股东，有些还是这些企业的缔造者，比如中国萃众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沈维挺、王瑞麟、李康年，康元制罐厂股份有限公司的周宗良，不一而足。

张福彭持有的公私合营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同样折射出早年“宁波帮”人士在中国火柴业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民族资本投资开设的第一家火柴厂，叫“燮昌自来火公司”，由宁波商人叶澄衷创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8月9日。一星期后，首批国产火柴上市。1930年5月17日，浙江定海人刘鸿生（注：舟山时属宁波）将鸿生、炎昌、中华三家火柴公司合并成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其时，张福彭投资大中华火柴公司，26年后，张福彭投资的股票被折合成5000股。“炎昌”是宁波商人邵尔康于宣统三年（1911）5月创办的，邵尔康当年集资5万元，选址浦东的烂泥渡。5年后，增资至15万元在浦东陆家渡开设分厂。1920年5月，邵尔康再增资至40万元在江苏的镇江建第三分厂。据统计，这三厂共计职工达1093人。张福彭作为“宁波帮”一员，积极参与民族火柴业的薪火相传。

如今，张福彭和家人留下的那一沓张薄薄的股票单，历透时空，承载史料，折射出早年“宁波帮”的创业伟业，并将成为天一阁的永久珍藏。

十六年时光 奏响“王庄三部曲”

——记作家浦子

林海燕

近日，浦子的长篇小说《大中》单行本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历时十六年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王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龙窟》《独山》《大中》“王庄三部曲”以虚拟的浙江山海县王庄为聚焦点，实现了作者“以百年历史，百位人物，百万文字，尽揽浙东人民的生存状态与风土民情”的构想，有评论家称它是“一部惟妙惟肖的浙东人的精神地图”。继《龙窟》入围茅盾文学奖后，《大中》再次为文坛所瞩目。

差些被作者放弃的作品——否定之否定

十六年前的一天，浦子在北京故宫游览，看到宫殿里用于防火的龙缸，灵光一闪，萌生了写一部关于龙窟的小说的念头。一回家，他就打开电脑，奋笔疾书，文思泉涌。可是，当他写完第一、第二章（约二万字）后，亢奋不再。阅读已经写好的章节，觉得文笔无味。停笔半年，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恼，一度甚至怀疑自己已经江郎才尽。半年后，再读旧作，又觉语感凌厉，气势逼人，是自己喜欢的形态。于是，再次投入到创作中。

在此之前，浦子已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东海》《江南》等杂志上发表不少中短篇小说，出过六七部书。在创作“三部曲”之前和期间，他特意阅读了大量社会学民俗学（特别是宁海地区民俗）的专著和读本，县志、族谱、县档案馆中的旧报纸及有关卷宗档案，佛教、道教、基督教等有关书籍，关于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县级及以下农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著作和资料，甚至民间流传的秘技之类的书籍资料，均在他的涉猎范围。

创作期间，父母亲的离世，让浦子对生命意义的认识更深了一层。工作繁忙，他学会了在各种场合写作的本领。在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在台湾高雄高铁站候车大厅里，在医院父母的病床前，甚至到西藏高原缺氧之地，都能见到他伏案写作的身影。

十六年时光，换来的是“王庄三部曲”的成功。

“崖山之后无中国”——心结之打开

浦子是从乡土走出来的作家，或者说，他一直踏在自己深爱的这块土地上。

有诗人在看了《龙窟》后，曾发出这样的赞叹：“难得有一本书把浙江人写得不像浙江人，杏花春雨被肌肉烈酒取代，琵琶和越剧的清音，也淹没在仿佛每一个音节都会滴出血来的宁海平调的吼叫中。”一位南方作家之所以能将小说写成这样，浦子以为：一是受家乡宁海“七山二水一分田”独特地理环境的影响，宁海既有高山的挺拔，又有大海的宽阔，让他的小说语言弥漫着一股刚烈之气。二是受家乡人的影响。宁海县地处中国的最东边，是个移民县。“三部曲”描写的虽是浙东地域的风貌特征，反映的却是大中华的核心内容。

针对这些年网络上出现的“崖山之后无中国，大明之后无华夏”的历史学论调，浦子认为要解开这个结，必须做两件事：一是复苏知识分子身上的硬气和正气；二是继承和发扬以儒学精华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他认为



浦子近影

中华传统文化不是凝固的，而是一直以开放的姿态兼容并收着各类先进文化。浦子特别赞赏圣贤、明代大儒方孝孺，称方孝孺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良心。他非常厌恶诋毁方孝孺的那些人及其言论。“三部曲”的主人公王世民、王传达、王德青祖孙三代，既是具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勇气的硬汉，又是以儒学为本兼蓄外来文明的君子。全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不正是中华崛起、实现中国梦的希望所在么？

爱家乡，并非一味唱赞歌。在“三部曲”里，作家显然揭了家乡的许多“短”，直指人性的堕落和黑洞。这似乎可以用爱之深、恨之切来予以解释。

纷繁庞杂的描写——推广之前景

从《龙窟》到《独山》，再到《大中》，“王庄三部曲”无疑倾注了作者的全力，作品的内涵是厚重的。作品选择了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一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曾经让浦子着迷，二是作家的家乡本身就有浓郁的鬼神文化。“三部曲”中有这样一组细节：第一部《龙窟》中的主人公王世民被人为地残害成一个肉球，第三部《大中》里王世民的后裔娶妻、贤达因近亲结婚产下儿子，儿子一出生就是个肉球。浦子说这不是重复，而是强调和象征历史的不是一个圆，而是螺旋形的航路，不是提升，而是提升。

通读“三部曲”，不难看出评论家李敬泽所说的“在想象中，浦子使他的故乡绚丽辉煌，不像《百年孤独》那么孤独，也不像约克纳帕塔法那样破碎绝望，甚至不像高密东北乡那样受远方的冲击，这里就是此地，就是此时，此时此地就是地久天长，永恒之中的人们像神一样行动，像神一样被记忆和怀想。”评论家雷达说，“浦子在作品中进行了一次富有生命力的奇诡想象，他试图通过这次想象，在民间找寻现代人久违了的勃发的原始强力。”

浦子的“三部曲”想告诉世人什么？评论家陈思和教授说：“这不是一个光明的故事，而是充满了极为复杂的意象；文本运用了许多民间文化的形态和手段，但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这部小说从叙事上说，与民间文化的单纯、朴素、明朗等因素反其道而行之，暗藏了新文学传统中知人论世的辛辣眼光。”

有专家指出，“王庄三部曲”纷繁庞杂的描写，为文本解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丰富多彩的民俗描写为民俗学研究者提供了文学标本；大量社会制度的描写给社会学家提供了关于社会基层治理、社会制度设计等研究标本；大量心理和景色描写，则提供了心理学、美学上的研究标本。

更有专家指出，对“王庄三部曲”的传播和推广，目前刚刚起步，还有漫长的路可走。



浦子创作的“王庄三部曲” (林海燕 供图)